

隋朝邺城“难治”试析

朱和平

关于隋朝邺城“难治”的问题,在有关隋朝历史文献中,一再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长期以来,除了周一良先生在其《读〈邺中记〉》一文中认为是该地工商业繁盛、商人活跃的结果^①以外,似乎尚未有人注意及此。本文拟在周先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孔之见,当否未敢自必,敬请周先生及同仁批评教正。

—

邺,殷商时属相,春秋时为晋东阳之地,以后归齐所有。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之地”^②,始有邺城。不过,当时仅为抵御戎人、狄人,以保卫诸夏封国的军事堡垒性质的城堡而已。

由于邺城地理条件优越,西靠太行山,南临黄河,东部由河渐海,形成道道条条的漕海运线,北面又有富饶的河北平原,所以,在战国郡县制出现以后,邺便成了有名的县邑。到西汉时期,高祖始置魏郡,以邺城为治所^③,邺逐渐成为人口众多,经济富饶的著名古城。

然而,邺城在河北地区,在整个北部中国乃至全国地位的重要时期,尚不是秦汉时期,而是在魏晋及北朝时期。曹操为魏王时,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定都于邺,使邺城上升到国都的地位。在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先后定都于邺,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取代之时,邺是东魏、北齐之都城。在这一时期,邺城有时失去都城地位,沦落为一般性地方城市,但其地位的重要性并未完全丧失。它在统一政权下,是控制北部中国,尤其是关东地区的重要据点;在分裂割据时期,它成为各个

割据势力相互争夺的对象。邺受到如此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它是传统的经济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得邺城,便可以控制河北及其以东地区。难怪在淝水之战以后,当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之日,邺城成为后燕与北魏你争我夺之地,也难怪在北朝的历次农民起义和边镇起义时,都把攻击矛头对准邺城,不遗余力地去攻取它。

邺城在隋代以前地位的不断上升和所显示的重要性,在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注重的同时,他们也为维护、加强和巩固其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除了在这里设置郡、州治所,成为国都和营建其城池城防以外,主要在于向这里迁徙人口。而这种人口迁移除了统治阶级和驻守的军队以外,还有那些被统治者视为不易统治和控制的反对势力,因为这种做法是秦汉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手段。

邺城地位的上升和人口的徙移,不仅使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激增,而且也使这一地区成为豪猾之徒汇集的地区。以前者而言,仅北魏末年,孝武帝元脩西入长安,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下令迁都邺城。这次迁都所引发的移民,据史载:“天平初,迁邺,……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狽就道。”^④被迁人口多达四十万户,依每户四口计算,总数高达一百六十万。如此众多的人口,而且主要是那些贵势之家的迁入,势必一时间造成该地人口剧增,导致生活发生困难,引发各种矛盾。高氏集团尽管为安抚这庞大的移民群,规定“百官给复三年,安居人五年”^⑤,并且腾出邺城四周百里之地以居新迁民户,但是,以东魏、北齐之国力、财力、政治措施,对下距隋之灭北齐的区区五六十年,可以肯定这种庞大移民给社会带

来的不安定因素并未消除。拿后者来说,邺城地位由普通城堡,逐渐上升到县、郡、州治所,再到国都,在这里本身就增殖和造就了庞大的豪族贵族集团。外来的和土生土长的豪强大族的汇合,由于在争夺权力、土地、人口方面,在维护既得利益和争取更多更大利益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因而结朋党、武装反叛、蛊惑人心等事件时有发生。如元康九年(299年)四月,曾发生过邺人张承基等聚众数千,谋起义之事。前燕慕容儼时,邺城民变兵乱迭起,每夜攻劫,晨昏断行。北魏神龟三年,清河王元怱被杀以后,同元怱交情很深的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便与其弟给使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纂起兵于邺^⑤。北魏末年,高氏集团能够在河北立足、定都邺,是因为河北大族,特别是高乾、封隆之等人支持的结果。这正如《北齐书》卷21论所谓:“高、封二公,……既克本藩,成其让德,……高祖因之,遂成霸业。”也许是由于高欢感受到了这些豪族势力在他建立和巩固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他取代元氏政权以后,对这些豪族势力采取了庇护、纵容的政策。迁邺之后,吏治败坏,镇守邺城的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高欢请治之。欢曰:“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后来,高欢率兵西征,杜弼请求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鞘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鞘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⑥这种纵容政策的结果,必然使他们变本加厉。据《北史》卷30《卢同传》云:当时户调绢每匹规定长四丈,而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征收户绢时,每匹在七八十尺,粗米也是如此。这种行径,无疑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史载天平初,邺民迭相起事,正说明了问题。为此,东魏不得不立严制进行镇压^⑦。由此看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大族、贵族官僚聚居的邺城,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之中。这种不稳定状况,待到北周外戚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并灭掉了北齐,统一全国,建立了以关陇士族集团为统治核心的政权以后,又增添了新的矛盾源,给本来就不安定的社

会注入了新的动乱因子。关中士族集权的统治,毫无疑问地与以邺城为中心据点的河北士族集团发生矛盾,引发河北士族集团的强烈不满,使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成为隋王朝“难治”之地。

二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导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少数民族争夺激烈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但是,到隋王朝时,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并未完全消失,因民族矛盾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便成了邺城“难治”的另一原因。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及随后军阀间的相互征战,使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因而中原王朝无力抵御少数民族的内迁,更谈不上控制和奴役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了。《晋书·文帝纪》曾对当时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谓曹魏之末的景元四年(263年),“九服之外,绝域之民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占西晋全国人口数的一半还多。如此多的内迁的少数民族,其人居地固然主要在关中地区,但是入居河北地区,特别是邺城地区者也不在少数。在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曾向这里迁徙了大量的少数民族。

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入主这一地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众所周知,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即使是与汉族交往较多的匈奴、鲜卑族都还是处于奴隶制时代,至于其它民族则大多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他们乘西晋八王之乱,司马氏骨肉相残的机会,企图重建一个个独立国家而起兵,这从刘渊起兵的目的便清楚可见。据《晋书·刘元海载记》云:“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因此,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企图在中原地区建立其落后的生产关系,发展其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一时间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激起了汉族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坞堡的出现便是汉族士人企图自保,与少数民族斗争的一种形式。再由于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前,中原的统治者大多推

行民族歧视政策,所以到这一历史时期情况大为改变后,少数民族对汉族、汉族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残暴的报复和反报复行为。稽诸史实这种行为在邺城地区尤为激烈。

总之,在隋代以前,河北地区是民族融合时间最为持久的地区,也是民族融合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影响极为深远的地区,这种影响,使民族融合的余绪一直到大一统的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因为以杨坚为首的关陇土族集团对这一地区的统一,实际上是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鲜卑族本身、汉化的鲜卑族和鲜卑化的汉人,面对关陇集团的统治和推行的政策,必然要经历一个抵触、反抗,再到接受的过程。隋正处在抵触、反抗阶段。所以,作为民族问题最严重的邺城地区,在隋代难治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

造成隋代邺城“难治”的原因,除上所述以外,还与隋王朝在统一南北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邺城地区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有关。

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在魏晋北朝时期邺城具有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因此这一地区在作为河北地区乃至北部中国政治中心的同时,导致了这一地区是豪族集中聚居地,汉族官僚、少数民族酋长、部落首领都以此作为其发展势力之地。而鲜卑贵族每次作战,都要掳掠人口作为官私奴婢,从北魏道武帝打败后燕到隋统一北方的二百年间,战争频繁,奴隶和杂户的人数不断增加,隶户、杂户和奴婢世代相传,为数甚大。再加上北齐所实施的均田制度中,规定奴婢依良人授田,所以刺激了豪族地主和部落首领掳掠人口,大量占有奴婢,使这一地区人口极为稠密,造成地狭人稠、人地不相称的后果。早在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分全国为十九州时,司州所辖三魏、并州一部及幽、冀大部为今河北地。司州所领魏郡、阳平、广平等三郡为今冀南一部;今涉县以外、元氏以西为并州乐平国,尚义、张北、唐保、丰宁、栾平、围场、隆化、承德、平原、宽城、

青龙、迁安则为鲜卑诸部地。境内户数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时西晋户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而河北几占四分之一。到前秦灭亡前燕时,幽、冀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前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①。这个人口数约占西晋灭吴以后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强,足见其人口之众!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势必引发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难怪在隋开皇十二年隋文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时,河北地少而人众,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幼更少!针对土地严重不足的情况,在隋王朝所实行的均田制度中,只得以损害占有大量奴婢和荫庇人口的豪族地主的利益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这一制度对保留奴隶制剥削关系的世家豪族是一个极大打击,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他们的反抗。

在人口与土地占有之间发生上述矛盾的同时,又恰逢河北地区在隋朝初年发生饥荒,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本已怨声载道的豪族地主和广大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隋文帝在开皇十七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持节巡省河北。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②大业三年四月,隋炀帝下诏安辑河北,巡省赵、魏。十月,诏令河北诸郡工艺千余家迁往洛阳^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措施。可惜,矛盾尚未解决,由于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穷兵黩武,隋王朝很快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吞没,邺城“难治”的顽症,历史地留给了大一统的李唐王朝去解决了。

①周一良《读〈邺中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②扫叶山房《百子全书》载《管子》第8卷《小匡》第20。③《汉书·地理志上》。④《魏书·常景传》。⑤《魏书·孝静纪》。⑥《资治通鉴》卷149,梁武帝普通四年条。⑦《北齐书》卷24《杜弼传》。⑧《魏书·孝静纪》。⑨《资治通鉴》卷102太和五年条。⑩《资治通鉴》卷178开皇十七条。⑪《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三年条。

(朱和平:郑州大学历史所副教授

邮编:450052)

责任编辑:强 胜